

“西域遗珍”佛教展品概述

敦煌组 刘波

自古以来，新疆就是各民族聚居、各种文化交融的地域。历史上曾有多种宗教在这里传播、发展，影响了当地人民的文化与生活。多宗教并存格局既是古代西域文化的重要特点，也是当代新疆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从公元3世纪到13世纪，新疆地区主要流行的宗教是佛教。

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佛教广为西域各族人民所信奉，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佛教信徒开凿石窟、雕塑佛像、绘制壁画，现在我们依然能在克孜尔、柏孜克里克、库木吐喇等佛教遗址看到精美的艺术遗存。与此相辉映，新疆也留下了为数众多的佛教文献。透过这些文献，我们可以看到佛教在西域传播的历程，看到古代西域人民的信仰，更可以看到西域各民族文化上的碰撞。除此之外，某些文献还在书籍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西域遗珍——新疆历史文献暨古籍保护成果展”展出了三十余件新疆出土的珍贵佛教文献，从多个角度反映了新疆古代佛教文化的面貌。下面我们择要介绍一些佛教文献展品，从一个侧面领略新疆古代多元文化的魅力。

现存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佛经

西晋月氏僧人竺法护译《诸佛要集经》(复制品)，是迄今所知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汉文纸本佛经，卷尾有题记“元康六年(296)三月十八日写讫”。它原为日本大谷探险队20世纪初于吐鲁番吐峪沟石窟掘得，其主体部分的图版刊于《西域考古图谱》。然而此后原件大部分已佚失，至今不知所终，学界对其的研究完全依赖于《西域考古图谱》所刊载的图片。幸运的是，此件佛经的12件残片，于2005年发现于旅顺博物馆。

作为书籍，这些残片是书籍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文献：它们不仅是现存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佛经，同时也是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书籍。因此，这些残片虽然破碎，保存的文字信息不多，但其在书籍史、文化史上的价值却是无法估量的。

西域地区建寺的记载

可以说，本次展览展出的所有佛教文献，都在从某个角度反映了佛教盛行西域的历史。其中有几件更是直接地记载了造寺开窟的史实。

清拓本《沮渠安周造寺碑》，是反映北凉时期佛教发展的重要文献。此碑清光绪八年(1882)出土于今新疆吐鲁番高昌故城，1902年被德国格伦威德尔吐鲁番探险队购得，运到柏林，存于民俗学博物馆。在运往柏林途中，此碑断裂为二，二战中不幸被毁，仅有拓本流传。此

拓本为光绪三十四年（1908）刘拙东据端方拓本响拓（即摹拓），有端方、樊增祥、张祖翼、张伯英、许炳璈等人的题跋。碑文记述笃信佛教的北凉残余政权进入吐鲁番，崇奉佛教，兴建寺庙的史实。其文章风格、字体特征、所记习俗等方面，都可见儒家文化和佛教通过北凉对高昌的深远影响，从中可寻出两晋十六国时期部分中原汉族知识分子流徙河西，并将汉文化移植、保存和储藏于西北地区的史迹。

麹氏高昌国延昌元年（555）刻石的《麹斌造寺碑》，是见证高昌国时期佛教发展的重要文献。此碑出土于吐鲁番三堡，后运至迪化（今乌鲁木齐），不幸于 1928 至 1944 年间遗失，仅有拓本传世。展出者为清拓本。据碑文，该碑为麹亮为其亡父宁朔将军麹斌所建之功德碑。所刻铭文前有一段很长的骈体文序，说明立碑目的是纪念麹斌生前施舍田宅建造佛寺的功德。碑阴附刻麹斌施产造寺时所订立的一件契约，即《麹斌施入记》。此契约立于麹氏王朝第六代君主麹宝茂建昌元年（556）十二月廿三日，后有麹氏高昌第六代国君麹宝茂及下属官员的题衔。此碑不仅反映了麹氏高昌国佛教盛行，家族在凿窟建寺中的作用，在叙述麹斌生平时还记录了高昌国突厥汗国的交往，以及高昌国的土地制度，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

西行求法高僧文献

宋以前，西行求法、寻取真经的高僧历代不乏其人，他们一方面是佛教传播的使者，另一方面也架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此次展出的多件文献，反映了中国僧人西行求法的历程与贡献。

东晋僧人法显（334—420）的《佛国记》一卷（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本），是法显西行历程的记载。法显自东晋隆安三年（399）从长安出发，经焉耆穿越大漠到达于阗，翻越葱岭，前往古印度、斯里兰卡等地，取道海路于东晋义熙九年（413）回到建康（今南京）。此书原名《历游天竺记传》，又名《法显传》，对所经历约三十国的山川风物都有详细的记载，为现存有关中外陆海交通的最早史料。

北魏秘书监杨衒之所撰《洛阳伽蓝记》（明如隐堂刻本）其主要内容为北魏洛阳城内外佛寺。难得的是，书中保存了北魏时期重要的中外交通史著作——《宋云家记》。宋云为敦煌人，是北魏孝明帝时代的一位僧官，受胡太后委派，与惠生等人前往天竺寻求真经。神龟元年（518）年底从洛阳出发，西行至今巴基斯坦白沙瓦一带，正光三年（522）返国，带回大乘经典 170 部。他将沿途所见所闻和各国风土人情写成《宋云家记》，对于阗等西域佛教王国详细的记录，为研究中外交通史、西域佛教史的重要资料。此书不幸亡佚，主要内容为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辑存，因而保存至今。

唐高僧义净（635—713）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卷》（明正统五年[1440]北藏本）

是唐代著名的佛教史传。义净于唐高宗咸亨二年（671）由海道往印度求法，经二十五年，历三十余国，得梵本佛典约四百部。在归途中，他写成《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书。《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所收皆为唐时曾赴西域、南海、印度等地僧人传记，兼及义净本人旅行情况，为研究当时中西交通的重要资料。

在西行求法高僧中，玄奘大师（600—664）是成就最高的一位，其生平最富传奇色彩，其故事也最为脍炙人口。此次展览中展出了多件玄奘大师相关文献。

玄奘于贞观元年（627）西行印度求法，贞观十九年（645）回国，历时19年，跋涉5万余里。回国后，奉太宗敕命，贞观二十二年（646）撰成《大唐西域记》，记录西行见闻，是研究中亚、印度及丝绸之路各国政治、军事、历史、地理、宗教、文化、语言文字和社会风情的珍贵资料。此次展出的吐峪沟石窟出土的唐写本《大唐西域记》，其抄写年代距成书时间的较近，虽为残片，保存文字不多，但可以据此了解该书在西域流传情况。

玄奘弟子慧立撰、彦棕笺补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十卷》，是另一部记述玄奘游历诸地情况的重要著作，其内容可补《大唐西域记》之缺。此次展出宋绍兴二年（1132）王永从刻资福藏本，为该书现存最早的版本之一。

此书曾由胜光法师翻译成回鹘文，本次展出了国家图书馆藏11世纪回鹘文写本。此本为梵夹装，纸张为黄褐色麻纸；双面书写，每面27行；四周有朱笔边栏；每叶左边用小字回鹘文注明叶码，现多残损。此写本1930年前后发现于新疆，其中240叶由袁复礼先生协助购藏国立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一部分被Joseph Hackin收藏，后归国家图书馆；另有部分藏于法国吉美博物馆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建国初，在赛福鼎、郑振铎、季羨林、向达、王重民等先生的促成下，此书经冯家昇先生整理，于1951年影印流传。这也是建国后最早的新疆文献整理成果，影响深远。

此外，朱墨双色拓本《玄奘取经路线图》，形象地展示了玄奘西行取经的路线，对于观众了解玄奘也不无益处。

多文种佛教文献集萃

此次展览展出了多个文种的佛教文献，如：抄写于三世纪末四世纪初的《贤劫经》为梵文写本，可与月氏僧人竺法护译汉文本进行对比研究；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的西夏文本《佛经残片》（复制品），反映了西夏文化传入吐鲁番的史实；高昌回鹘时期印本兰扎体梵文《佛经残片》（复制品），同样出土于柏孜克里克石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搜集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所藏清初刻本《圣忏悔灭罪大解脱普闻成等正觉生庄严大乘经》，为托忒蒙古文本；该办公室所藏的清金银汁抄本《圣忏悔灭罪大解脱普闻成等正觉庄严大乘

经》，则为蒙古文本。此外尚有汉文、梵文、佉卢文、焉耆文、于阗文、回鹘文、藏文等文字抄写刊刻的佛经多种，不一一具列。这些写本不仅是古代语言研究的宝贵资料，更重要的是，它们集中体现了西域佛教文化的丰富性与西域佛教传播的广泛性，在文化史的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佛教是古代东方众多民族共同的信仰，因而其经典在南亚、中亚、东亚各语言间屡经转译，形成多种语言的文本。同一经典的多文种文本，不仅可以提供佛典传播及在此过程中因各种原因发生变异的信息，也是古代语言文字与比较语言学的宝贵资料。此次展览中，佛教文献中即有多组为同一经典(或同系列经典)多文种文本并列展出，提供了饶有兴味的对照。前文提到的汉文、回鹘文《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即为最为典型的一例。此外还有焉耆文、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及《佛名经》相关文献。

《弥勒会见记》是一部印度古代剧本，原文已佚。全剧 27 幕，内容为弥勒成佛的故事。其文韵散结合，形式上与《五卷书》等古印度叙事文学作品相同，书中使用了“幕”、“退出”等舞台术语，韵文前标出曲调名称。此剧的两种文本均发现于新疆地区，在本次展览中并列展出。焉耆文本由圣月菩萨从印度文译成，成书时间约在 6-8 世纪；其写本出土于焉耆县七个星佛寺遗址，共存 44 叶。回鹘文本由智护法师从焉耆文本译成，成书时间约在 8 世纪；其写本出土于哈密，存 293 叶（586 面），较为完整。这两个写本表明，《弥勒会见记》流行于唐代，比戏曲繁荣的宋、元要早得多，这对中国戏剧史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佛名经》是印度佛教的经典之一，有北魏菩提留支译汉文本，是较为常见的本子。此次展览中展出了和田所出三世纪梵文写本《佛名经》，为该经现存最早的写本之一，虽仅一叶，且有残缺，但其价值不可低估。此件为梵夹装样式，但未见穿孔；经文中夹有彩绘佛像，佛像与正文连排，并不像后来的汉文本，佛像排列整齐。与此相应，展出了安徽博物馆藏北凉神玺三年（399）写本《贤劫九百佛名品第九》与五代后梁贞明六年（920）写本《贤劫千佛名经卷上》，这两件均为敦煌藏经洞出土，都有纪年题记，后者每个佛名之上均有彩绘佛像，与三世纪梵文写本交相辉映。

文化交流的写照

古代西域既是佛法昌明的佛国，也是佛教东传入中原的重要孔道。近代新疆所出土的诸多梵文佛经，便是西域在佛教史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的真实写照。中原主要仰赖西域的传递，吸取了印度佛教的精华，进而发展了佛教。众多西域僧人来到中原，传法译经，推动了中原佛教的长足发展。展览展出的多件展品，见证了西域与中原的文化交流。

国家图书馆藏东晋（316—420）写本《放光般若经》，系敦煌藏经洞所出经卷之一。曹

魏甘露五年（280），僧人朱士行西行求法，历经艰辛抵达于阗，抄得此经梵本九十六章六十万余言，由弟子弗如檀带回洛阳。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始由于阗僧人无罗叉执梵本，竺叔兰口传，祝太玄、周玄明笔受，将其译为汉文。

此次展出的宋碇砂藏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八十卷，为唐代高僧实叉难陀（652-710）所译。实叉难陀为于阗人，应武则天之邀，携广本梵文《华严经》至洛阳。证圣元年（695）至圣历二年（699），与菩提流志、义净、复礼、法藏等共同译出八十卷本《华严经》。此外，他还译有《大乘入楞伽经》、《文殊师利授记经》等佛典。

日本元文三年（1738）狮谷白莲社刻本《一切经音义》一百卷，是唐代高僧慧琳所撰的文字音韵学巨著。慧琳是疏勒国（今喀什地区）人，俗姓裴，开元（713—741）年间驻锡长安西明寺。他精通印度声明学和中国训诂学，历时二十年撰成此书一百卷。此书引《字林》、《字统》、《声类》、《三苍》、《切韵》、《玉篇》及诸经杂史，参合佛意，详察是非，注释汉文佛典中的生僻字，内容丰富，致用广泛。此书于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奏请入藏，五代时曾流行于契丹，宋以后国内失传。辽咸雍八年（1072），由契丹传入高丽，明天顺二年（1458）由高丽传入日本。清乾隆二年（1733）日本僧人据朝鲜海印寺刻本翻刻，即此狮谷白莲社刻本。清光绪初年，我国才从日本复得此书。

往来于丝绸之路的佛教信徒，也将写成的经卷从此处带往彼处，增进了各地佛教之间的交流。安徽省博物馆藏的北凉神玺三年（399）写本《贤劫九百佛名品第九》，卷尾有题记：“神玺三年太岁在卯，正月廿日，道人宝贤于高昌写此千佛名。”表明此件抄写于高昌（今吐鲁番），因某种机缘被带到敦煌地区，封藏于敦煌藏经洞，而在近代重见天日，提示我们丝绸之路上密切的文化交流。

发生在广袤的西域大地的文化交流，从来就不是单方向的。中原佛教的成就，也源源不断地传到西域，影响了西域的佛教发展。

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高昌回鹘时期写本《根本菩萨多部律摄卷十》，经文为汉文，但行间夹写回鹘文批注，是高昌回鹘僧人诵读汉文佛经的记录，可见当时回鹘僧人曾有以汉文佛经为读本的历史。同样出土于柏孜克里克石窟的金刻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为金藏的零叶，与名满天下的《赵城金藏》实属同版所印。其背面有回鹘文手书题记，可见也曾为回鹘僧人所持用。

国家图书馆藏吐鲁番出土辽刻本《妙法莲华经卷六》，其版式与应县木塔出土的辽代刻经版式一致，均为上下双边栏，栏中有花饰，经鉴定为同一版本。这证明了辽藏也曾传到吐鲁番地区，是辽代文化影响西域的反映。国图藏元代藏文写本《般若波罗蜜多经十万颂》，

部分文字仍保持古藏文特点，为此经少见的早期版本，见证了西藏佛教与西域佛教源远流长的关系。

各兄弟民族佛教徒不仅通过持诵汉译佛经，也将大量的汉文佛经翻译成自己的语言文字。回鹘文本世亲《阿毗达磨俱舍论卷第一》，系高昌回鹘王国时期写本。正面写有汉文题名，背面以回鹘文、汉文抄写，其回鹘文本译自玄奘译汉文本。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的回鹘文本《大般涅槃经》，也是高昌回鹘时期写本，系根据昙无讖所译汉文本译成。元刻回鹘文本《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则译自义净汉文译本。如果将这些文献置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考察，我们不难发现，他们不仅体现了回鹘佛教与中原佛教之间密切的关联，也彰显了回鹘与中原王朝密切的政治、文化联系。

多彩的僧人生活与民众信仰

很多佛教文献为我们了解僧人的生活与西域民众的宗教信仰，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如吐鲁番巴达木 113 号唐墓出土的《唐龙朔二年（662）正月西州高昌县思恩寺僧籍》，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部僧籍，上钤 9 方“高昌县之印”，可以据此考察唐代僧尼管理制度的详情。丹丹乌里克出土的于阗文《高僧买奴契约》，则为我们展示了七世纪末于阗僧人购买奴隶的细节。透过与此同类的一些文献，今天的人们可以了解古代僧侣的日常生活，这是社会史研究饶有兴味的课题。

吐鲁番安乐故城南佛塔遗址出土的北凉庚午年（430）写本《金光明经卷二》。题记中提到“胡天”，记录了高昌城内的祆教寺庙，史学家据此考见祆教流传于西域的史实。国家图书馆藏八世纪写本《观世音菩萨劝攘灾经一卷》，是产生于龟兹（今库车）一带的佛教疑伪经，其经文体现了中原泰山信仰与佛教观音信仰在西域的糅合。

结语

从佛教史、文化史的角度看，此次展出的佛教文献大多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此次展览所展出的佛教文献，从多个角度反映了西域佛教两千年来的传播、发展历程，见证了西域佛教文化的繁荣与辉煌，更是中西文化交流与融汇的真实写照。

应当指出的是，佛教文献只是展览的一个方面，更多简牍、文书、书籍、碑刻拓本、钱币，在更宏博的范围内以更广阔的视角，展示了新疆文化史的博大与深邃。徜徉于展厅，犹如漫步于历史的长廊，令人于无声中感悟到文化的力量。追昔抚今，以现代学术方法解读史料，透过历史观照现实，更可以为探讨当下复杂的社会问题提供一个耐人寻味的思考切入点。